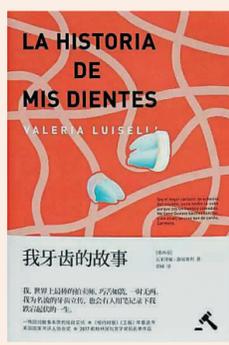


工厂车间里聊出的是笑话，还是活泼大胆的文学实验？

从《我牙齿的故事》看崭新文学形态下如何引渡传统



▲《我牙齿的故事》书影。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近照。
(均世纪文景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我牙齿的故事》是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它既可以看作是部小长篇，又是若干则短故事的合集，同时，它的写作过程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实验。小说作者是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墨西哥新生代作家里非常活跃的一个姑娘。《我牙齿的故事》的创作，源于一次“软文”写作的邀约。

在北美的大超市和小杂货铺里都能找到一种家喻户晓的“胡麦克斯”果汁，这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地区的果汁类产品第一大品牌，厂家创立于1964年，厂址在墨西哥城外偏远的郊区。工厂规模发展得家大业大，于是全资建造并赞助了一个艺术中心，就在工厂隔壁，取名“胡麦克斯艺术博物馆”。艺术中心在2013年初开张，有艺术经纪人找到了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请她为开幕展览写段导言。年轻作家受邀写些应景文章是常有的，如果应付了事，路易塞利写篇花式吹捧企业文化的文字，也就交差了。可是她不愿意。她思考了很久，决定把一次委约的写作变成大胆的写作实验，不是由她闭门造车地胡扯胡麦克斯工厂的企业神话，而是她领头破壁——打破工厂和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打破劳动者和艺术/文学之间的壁垒，她和胡麦克斯果汁厂的生产工人一起，协作完成《我牙齿的故事》。

在19世纪中期的古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职业：雪茄厂的朗读者，为

了减少重复手工劳动带来的无聊和厌倦，会有一位工人在车间为工友高声朗读文学作品。这个已经消失的工种给了年轻作家启发，她邀请工人和她一起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次“朗读+连载”的文学冒险。她每周写一段故事交给工人，工人们成立了阅读小组，聚在一起朗读、讨论，录下语音返回给她，她在此基础上定稿，就这样“攒”出了一部奇异的小说。

小说六个章节，由一个主观视角的序幕、四段第一人称的主题短故事集和一个旁观者视角的尾声组成。简单总结，这是一个“失败者”在生命的余光里回忆他倒霉的一辈子，他经历妻离子散，遭遇绑架偷盗，大半生惨淡经营艺术品拍卖事业，但是他热烈澎湃地活过，在光怪陆离的墨西哥社会里兴高采烈地叫卖赝品，临死也没有半点懊丧。小说的前五个章节和尾声形成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视角和文风都是迅猛一变。很显然，借着穷困文艺青年的眼光目送落魄男主角最后日子的“尾声”，是路易塞利真正意义独立完成的部分，写得舒展、诗意，对生命和命运的慨叹里能找到她既往作品的风格。前五个章节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口述故事，则要粗野生猛得多，奇妙地融合了文学的修辞和口语、方言的原生态，这是一部墨西哥当代的“聊斋”——工人的朗读、讨论和创造力，他们的文学实践，强势地介入了作家的写作。

这个故事集里的“夸张故事”

“比喻故事”“迂回故事”和“寓言故事”，每一则都像事先张扬的玩笑。男主角回忆了他一生目睹之怪现状，而这些墨西哥版拍案惊奇里的主角——所有消失在时间尘埃里的小人物，都顶着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名字。科塔萨尔是死于破伤风的邻居，富恩特斯是卖领带的销售员，普鲁斯特成了“我的叔叔”，普里·莫莱维因为嗜睡症而被母亲当成游手好闲的懒鬼……路易塞利也调侃了自己，在一则寓言故事里，她成了“即将出落成大小姐的中学生，总是因为不能正确发音而挨家庭教师的打”。这些看似粗俗的故事，散发出劳动者汗水的气味，工厂车间里机器和加工物的味道，以及一切浑浊的、热烈的、人间的味道。也许是故事的“地气”和对“大师”的调侃触怒了墨西哥的文学评论界，这本小小说在“老家”是被质疑的，书评大抵指责这是一本七拼八凑的“烂笑话”和“胡扯”。

但这并不是一本作者偷工减料的段子合集。在“省略故事”这个章节里，明显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作者敏感的审美自主，而她在追求修辞审美的同时，也警惕文学成为审美的空壳。“在他那覆海移山的自由面前，我们习惯于丈量世界的所有准则都变得脆弱不堪、昙花一现。”这桩看似行为艺术的文学实验，所追求的正是文学的自由和活力。和男主角的命运异曲同工，文学所拥有覆盖海山的自由，在于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当路易塞利藉由

《我牙齿的故事》打破果汁工厂和艺术博物馆之间的墙壁时候，并不是单方面地提升了工人的精神生活，作用力的箭头是双向的，文学发生在人间，创作和阅读形成积极互动的状态，促成了文学旺盛的生命形态。

传统意义上的名作家们认为文学的光环不复存在，读者越来越少。这个结论是可疑的，或者说，这是精英立场看到的惨淡现状。读者一直都在——墨西哥果汁厂的工人，电影《我的诗篇》里那些读诗、写诗的打工者，以及《诗词大会》的冠军外卖小哥，他们让人看到，“阅读”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普通人的日常中退场。

其实，《我牙齿的故事》创作过程和网络平台的写作有着相通处，在写作空间中，读者既是“参与”的，也是“生产”的，读者的意见和意愿介入了作品的肌理。这是一种开放的创作，按照学者亨利·詹金斯观点，这种写作部分地回归了神话、史诗、口述文学的生产方式，是参与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退散的不是文学的光环，而是作者的光环。在《我牙齿的故事》里，路易塞利是创作的主导者，但她甘于退到幕后，她突出了工人读者们的活力和创造力，而那个隐在草莽读者身后的“作者”，也就此背负了更重要的使命——怎样把文学传统引渡到新的文学形态中。

这是比指责“烂笑话”更迫切的文学命题。

绿意点亮了生活的表情，也藏着都市闲情的美学密码

倾听花草的召唤，请收下这张大自然请柬

■本报记者 许畅

人间四月天，芳草始生，樱花成云，恰是踏青好时节。眼下，都市人不愿负春光的需求集中爆发，带动了“花草经济”的大热——国内外赏花旅游路线持续火爆；鲜花电商平台崛起，养花插花渐成日常风尚；多肉植物大面积“圈粉”，各种晒图背后是主人养宠物般的喜上眉梢；园艺达人持续更新花草种植心得，小众博物学图书悄然升温……绿意，不仅点亮了生活的表情，也安放水泥森林中渴求都市闲情的心灵。

在科技日新月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总有人抱怨似乎失去了欣赏自然之美的时间和心境。其实，小区内、阳台上的方寸空间，也能一窥自然奥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近年来倡导博物学，他不仅写书，还参与多种博物类丛书的策划出版。“观照万千植物的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也是城市人文情怀的体现。”他说，绿植热以及背后博物学的兴起，是对自然教育、生态文明建设有益补充。不妨接过大自然发出的请柬，全身心体验绿植带来的惊喜，过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生活。

对绿色的天然向往，融入当代城市生态发展蓝图

爱花草，有许多理由。日前在沪举行的思南读书会上，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谈瀛洲、画家孙良从植物中发开去感叹：“花儿是一种奇迹般的东西，你如果亲手种出过花来，你就会想重复这种奇迹的体验。但这其中只有一半是你创造的奇迹，另一半是造物创造的奇迹。”

从童年就开始养花、为花卉写下美文谈瀛洲，常被朋友们笑称为“花痴”，他觉得都市人群尤其需要与植物产生关系，“我们行走时通常踩着柏油马路、人行道，跟泥土的接触特别少。其实，和活生生的植物打交道，不亚于摈下心境休息与复苏的开关。种花不在于多少，尤其在上海这种空间紧张的大城市，窗台上种个两三个就能带来赏心悦目的怡情享受。”

如今，对绿色的天然向往，不仅是个体或家庭的“小确幸”，也融入了当代城市生态发展蓝图中。国内外建筑师纷纷尝试立体种植设计，为大都市披上一层“绿色肌理”。比如，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是一一对分别高111米和79米的双子楼，沿着外墙层层种下730棵乔木、5000株灌木、1.1万株草本植物，错位布置的阳台，既实用又美观。新加坡樟宜机场采用大型垂直种植系统，将东南亚赤道雨林引入3号候机楼内部，植物挂毯巧妙将庞大工业建筑划分为不同的陆、空部分，并直通垂直空间的登机口。

在上海，也有不少绿意引入钢筋混凝土的创意。从地铁10号线江湾体育场站1号口走出来，眼前建筑外立面披着

绿色植物组成的“外衣”，绿墙种植面积约1508平方米，外墙绿化引进原产新西兰的千叶草，这种植物只要给一点阳光和水分，就能摇曳生姿，即使零下10℃低温也能顽强生存。到了高温天气，密布植物将有助于降低建筑内部温度，吸收汽车尾气，提高空气湿度，改善建筑周边微环境的空气质量。此外，浦东机场T2航站楼部分区域被改建成“候机室里的丛林”、九江路一幢老建筑中庭藏着迷你版“垂直森林”、苏州河畔天安阳光广场打造了“巴比伦空中花园”……它们无不集环境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和社会价值于一体。在建筑师斯坦法诺·博埃里看来，“垂直森林”或许是未来都市生活的样板间之一，平面绿化正向立体绿化延展。

从曼妙花影中，收获另一种都市闲情生活方式

越来越有人在悉心照顾植物、拥抱花草的过程中，重新思考自身和自然的关系，向往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种花人有时也会‘失控’，要避免养花成为负担，种植和观赏说到底，是怡然自得的都市闲情，从中体会人生况味。”谈瀛洲举例说，仙人掌“大豪丸”花和昙花都是开放时间很短的花，但正是在浓缩过程中，他察觉到美。“尽管塑料花比鲜花持久得多，但我们还是会送女孩子鲜花，就是因为鲜花不单单是对女性美的一种恭维，也包含了美的戏剧，生命的戏剧。”

“对植物的喜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共同特点。中国园林历史悠久，传统花鸟文人画也倾向于表现大自然的灵动，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孙良说，人与自然是“对话请教”的和谐共生关系，而植物的灵性与智慧，往往能启发人们对春花秋月的思索。因此，谈瀛洲在第一部专著随笔集《人间花草》里，为家庭中惯常养殖的扶桑、昙花、芍药、仙客来、风信子等50余种植物郑重立传，娓娓道来人与花草间的情缘，花草典故、种花秘籍信手拈来，与养花轶事相映成趣。其中《芍药》一文不仅“科普”了芍药品种与种植经验，还引用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所说的“情波”，认为“与花的凝视似乎有着能够灌注进灵魂的神秘影响，令人得到美的滋润与温暖，并念及逝水如斯的光阴”。

商务印书馆近年来也出版了“自然文库”“博物之旅”等多套丛书，在图书市场自成一景。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商务印书馆艺术与博物学总顾问薛晓源看来，绿植进入大众视野，对美学的苏醒大有裨益。花草草的学问看上去似乎“无用”，但这种“无用”恰是博物学的魅力。“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你我，身处高速复制的时代，与植物共处，如同打开一扇门，洞窥天地大美。看似小众博物学在公众层面的复兴，彰显了深度求知、艺术鉴赏、科技人文融合的多元欲求。”

时尚态度

当舞蹈遇见时尚，灵感与美在跨界中如烟绽放

在剧场看舞蹈，有的人像是偶入了迷宫，会恼：为何如此费解？实则当代艺术之舞蹈有许多另外的优点，最可贵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直面现场，折射出舞蹈对内心的启发，一千名观众有一千个出口。

如若舞蹈与时尚互语，还难懂么？当T台上的舞者以颠覆视觉的方式演绎时下最流行的时尚品位时，身着华服的模特将不再是唯一的漂亮风景。



《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服装设计手稿。



阔阔真的舞裙上身以立领、无袖、胸口中空剪裁，下身裙摆镶满水晶。(均上芭供图)

■本报记者 李硕

黑影幢幢，舞台上陶身体剧场的六位舞者像亟待破壳而出的蚕蛹，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独立，又通过身体彼此连接，与这个世界“对话”。这是一场难解的舞蹈谜题，一个清醒的梦……

可就是这样一场看似枯燥的舞蹈，却曾被山本耀司，这位日本乃至世界时装的掌门人所看中，力邀陶身体剧场在2016年Y-3春夏时装周发布会上进行数位系列(6)的表演。

一向与商业合作谨慎的陶身体本能地拒绝了。他们露出对仅仅是商业“撑场”的不耐，想要避开。商业和艺术的分野，是他们所在乎的。这关乎艺术家内心的尊严和骄傲，也的确透露出某种意指——舞蹈和时尚，明

明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艺术，若是硬拗在一起，的确太违和。可惜山本耀司忘了去感觉，他只想去获得一丝照片上早已拍好的、定格的、人云亦云的、概念的秀场。

这场跨界合作看似就要失败了，直到山本耀司第三次抛出橄榄枝：整个秀场的设计权全部交给陶身体，由他们来决定模特何时出没、如何结束谢幕等，以保证六位“黑色舞者”与他的“黑色设计”在秀场上妥帖地契合。

让步到什么程度？山本耀司专门为陶身体定制了一套舞者的服装，后者坚持没有穿。

于是在前年的法国巴黎时装周上，六位身着自制黑衣的舞者以极简、流动的方式始终以直线队列进行整齐的律动与行进；他们减掉了手舞足蹈，以脊

柱的旋拧和折叠来拓展身体运动的多种可能性。秀场里，山本耀司的曲线设计和陶身体所诠释的圆运动，恰逢其时地诠释出一种虎生风的、极简的动感，而这是生命中唯一永恒不变的定律，也是山本耀司唯一的灵感——运动中身体的简约之美。

同样身着黑衣的模特踩着原有配乐上新增的、富有跳跃感的鼓点，从舞者的四周绕场而过，目光冷峻，步伐利索。山本耀司以惯有的手法探索出男装中兼顾时髦与实穿的时装风格，而东方的审美元素配合陶身体的舞蹈，于西装中解构出舞蹈与时尚的融合。

这场Y-3时装周发布会，由此大获全胜。设计的极简、律动的线条、统一的色彩……服饰与舞蹈的艺术理念不谋而合。这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手脚

头肩的删减，音乐律动的抽离，观看维度的压缩……直至无可减。极简、线条和色彩，这三者借用Y-3秀场巧妙地连接起舞蹈和时尚的共性，组成了一场塞纳河畔的聚会，黑衣舞者与黑衣模特互不干扰，却又自成一体。

陶身体与山本耀司的成功合作，绝非秀场上舞蹈与时尚融洽共生的单一范例，却也透露出舞蹈和时尚欲要彻底融合、背后的重重压力。面临阿迪达斯总部、山本耀司工作室与经纪公司的施压，若是陶身体“就范”于这三种任何一方的压力，更多地服务于现场内容而失去舞蹈艺术所传达的意境，就会让表演艺术沦为商业的陪衬，两者之间因为失衡而以打架告终。

舞蹈和时尚，两者之间处处隐藏着互通的、相似的节奏，若设计师或

编舞者乍然见之，便能够搭上同律的脉搏。若只是为了商业撑场而无自邀请，则同时轻踩了两者的痛点，打不开关键则意味着忽略了最叫人称赏、最幽微迷人的现代艺术价值。在陶身体剧场艺术总监陶冶看来，舞蹈和时尚都是“向前看”的艺术，时尚可以演绎摩登的浪潮，而舞蹈则能涤荡人心，触发对未来的思考。

除了陶身体，不少芭蕾舞团也吸引了时尚设计师的目光。下月即将上演的芭蕾舞《妮娜物语》服装设计广川玉枝，曾经是著名品牌三宅一生的团队成员，她擅长使用蕾丝、面具和流苏。而上海芭蕾舞团近年来重要舞剧作品中，来自欧美名家的时装设计师灵感也源源不断、层出不穷。

由上海芭蕾舞团与著名品牌皮

尔·卡丹联合打造的原创时尚芭蕾舞剧《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首演于2010年)，也求证出舞蹈与时尚的渊藪。皮尔·卡丹及旗下设计师为舞剧各个角色精心设计的服饰华丽且充满异域风情；忽必烈大汗和王后的服饰尽管来自于皮尔·卡丹的想象，仍可找到元朝的痕迹。比如，类似织金锦的闪光面料，王后头上高约两尺缀有珠翠的“顾姑冠”；阔阔真公主的舞裙更为新颖现代，上身采用立领、无袖、胸口中空的剪裁，下身及膝盖的裙摆镶满闪亮的水晶；马可·波罗、他的父亲和叔叔则穿着宽袖衬衫和紧身马甲，借鉴了当时威尼斯的服装特色；马可·波罗的马甲肩部微微竖起，融入了元朝蒙古服饰的特点，与阔阔真公主舞裙的肩部设计相呼应。阿拉伯舞、印度舞、蛇舞、蒙古舞的服装也尽显异域风情，尤其是蛇舞中模仿眼镜蛇蛇皮的绿色紧身不对称连体舞衣，配合舞者柔软的肢体动作，令人印象深刻。当阔阔真公主无法与马可·波罗相守，强忍泪水披上层叠的纯白婚纱时，波斯舞者们跳起了欢快的庆祝舞蹈，女孩子们穿着裹胸和宽松的长裤；男孩子们或是穿着长袍，或是披风。男男女女，穿着上都镶嵌了珠片，也都选择了鲜艳的蓝色和紫色搭配银白色，蓝、紫色也恰恰是古代波斯人喜爱的颜色。

由于舞蹈与美学的关联太紧密，许多时尚大片、时尚宅邸也往往“不放过”展示前卫与时髦的机会。舞者们为杂志拍摄大片已是稀松平常。此前在上海陕西北路上，由Prada(普拉达)品牌修复一新的荣宅老宅，也见证了名流云集盛况，许多知名舞者也由此成为座上客。

舞蹈与时尚，相适宜，却又相离散。打破艺术的藩篱，当两者相知相许时，也许才是跨界的真正魅力所在。